

魏 晋 南北朝 文学与文化论文集

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编

WEIJINNANBEICHAO WENXUE YU WENHUA LUNWENJI

南开大学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 论文集

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出版人 肖占鹏

承印 天津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5.625

字数 446 千字

印数 1—1000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由传统学问走向近代学科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的轨迹述略	徐公持(1)
从雅化到俗化	
——东晋和明代后期江南士风研究之一	罗宗强(22)
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	周勋初(40)
略论六朝文学·文化·文物之综合研究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卞孝萱(48)
六朝杂拟诗题材类型论	洪顺隆(54)
从主题批评到文体批评	
——论魏晋时代文学批评模式的转换	胡大雷(74)
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	王 玫(89)
齐梁诗歌的俗化趋势	李文初(103)
论南朝文学之“抒情”	汪春泓(115)
关于墓志文体的三个问题	程章灿(133)
二十世纪嵇康研究	吴 云(144)
慧远庐山结社及其文化意义	孙昌武(157)
什译《妙法莲华经》与文学譬喻	陈允吉 卢 宁(175)
郭象注庄的特色	唐亦男(186)
略论魏晋玄学的宗旨及相关问题	唐翼明(203)
从黄金到土泥:中古时代的清谈与俊辩	范子烨(211)
陶渊明与他的“拟古”组诗	倪豪士(222)

陶渊明《饮酒》诗三问·····	齐益寿(238)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试论陶渊明的少年形象·····	陈怡良(260)
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	张可礼(275)
朝鲜诗歌中有关陶渊明之饮酒诗·····	金周淳(297)
干宝考·····	李剑国(310)
谢灵运年谱考辨·····	宋 红(335)
谢灵运被劾真相及死期考·····	李 雁(350)
刘萨荷故事研究(之一)	
——以《冥祥记》为主的考察·····	王国良(361)
正史与《世说新语》:士族文人政治心态对比论·····	宁稼雨(369)
物与志——明世说仿作·····	钱南秀(395)
“候人兮猗”:望夫石传说的原型分析·····	李道和(412)
《曹瞒传》考论·····	熊 明(424)
刘勰为什么提倡风骨·····	杨 明(440)
旧钞本《文选集注》传存(流传)概略·····	横山弘(450)
“鸿笔”辨	
——《文心雕龙·镕裁》篇“三准”所针对的文体探讨·····	邓仕樑(453)
《文笔式》考·····	卢盛江(463)
有关“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的若干问题·····	今场正美(481)
附录·····	(489)
后记·····	(492)

由传统学问走向近代学科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的轨迹述略

徐公持

20 世纪虽然与其他世纪一样在历史上倏忽而过，但它在中国却留下了一道特别浓重的足迹，因为中国在这百年中的确发生了远超过其他世纪的变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分支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来说，也可以以小喻大地清楚看到这一变化。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内，在规模上由小变大，在形态上由零散变系统，在观念上由传统变为现代，在方法上由前科学变为科学。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一样，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发生了质的飞跃和转变，它由一门古老的传统学问，变化为近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时期，在此绵延四百年中，除了西晋曾有数十年短暂的统一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全国分裂状态。即使是西晋，它也未曾出现过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可以说，这四百年基本上是所谓的“衰世”时期。与此前的汉代、此后的唐代相比，它确实只是两大统一强盛帝国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从文学上看，与声势煊赫的汉、唐文学比较，此时期的文学确实总体上显得不那么声势浩大、规模壮阔，引人注目的程度自然稍逊一筹。从文学本身看，除了建安诗歌颇含慷慨悲凉气质和北朝民歌具备壮健豪宕音调外，那西晋文学的尚丽倾向，东晋文学的玄虚风气，以及南朝文学的靡弱体质，都难以令后世研究者推尊。所以在后世研究者的目光中，本时期文学是难以同汉、唐盛世相提并论，甚至比宋、元、明、清也稍不如之。总之，本时期文学，除陶渊明、曹植等少数几位重

要作家外,其他作家作品常常进入不了研究者的视野中心。为此,本时期文学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往往难以成为重点时期,当然也难以形成繁荣局面。相对而言,研究者不多,研究成果也稍少。这是本世纪以前的实际状况。

20 世纪一百年中,此一情况有了相当改观。魏晋南北朝文学,逐渐受到学界的注意甚至重视,甚至也还出现了一些研究的“热点”。百年中,古典文学研究业绩的相当一部分,是属于魏晋南北朝的。从研究者来说,也是代不乏人,甚至涌现了若干代优秀的杰出的学者。对此,需要作一番简要的回顾,以见其概况及发展脉络云。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与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样,在 20 世纪约可划分为四个大的时期。第一期为 20 世纪初至 1928 年,第二期为 1928 至 1949 年,第三期为 1949 至 1978 年,第四期为 1978 至 20 世纪末。

第一期可称为学科近代化的初创期或曰初步成立期。此时期内一些文化先觉者,用西方传入的近代现代观念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出现了近代文化的启蒙运动,此一运动通过 20 世纪初的渐进式的渗透酝酿,至五四前后,遂有“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烽起。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浪潮,直接影响到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在研究和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的领域中,这一条线索分外明显。20 世纪初的一些近代文化先觉者们,在传播近代思想文化的同时,也展开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新审视。不过他们首先抓住的对象是近古的白话小说和戏曲。20 世纪文学研究近代化的开创者王国维,他所写的中国第一篇近代性质的论文,就是《红楼梦评论》,嗣后不久后完成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就是《宋元戏曲考》。五四前后,“文学改良”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在将目光转向“改良”古典文学研究时,他的第一个对象也是《红楼梦》,接着就是《水浒传》、《镜花缘》、《西游记》等。与此同时,一大批新文学家也开始在 1920 年前后热烈地讨论起《诗经》来,而郭沫若在刚出版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后不久,就写出了《卷耳集》,这是部《诗经》民歌的今译集。新派学者研究选材的“两极化”,表明他们一方面要发掘传统文学中的民间

成分,为长期居于“非正统”地位的这部分文学正名,另一方面又对长期居于经典地位的那部分文学,褫夺其神圣的外衣,还它以人的文学本来面目。这是具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研究重点的选择。魏晋南北朝文学虽然未能在本世纪初的学科大转折中占得中心地位,也并未成为研究的死角。例如王国维在所著《人间词话》这部新旧结合型的文学批评专著中,即曾多处论及陶渊明,并将他作为“隔”与“不隔”理论的重要例证。稍后数年,鲁迅也已经开始收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资料,默默地进行着他的开拓性工作。这两位大师之外,尚有一批新式的或旧式的学者,在做着本时期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在此我们不妨举出实际成果,来展示他们的劳作(以时代先后为序):

1900年,李详《文心雕龙》补注面世;

1901年,吕锦文《文选古字通补训》五卷(传砚斋刻本)刊行;

1904年,朱绪曾《曹集考异》(江南书局铜活字《金陵丛书》本)出版;

1910年,鲁迅开始辑魏晋南北朝小说佚文(即《古小说钩沉》);

1911年,丁福宝《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行世;

1913年,鲁迅开始编校《嵇康集》;

1916年,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六朝诗》刊行;

1919年,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印行;

1921年,黄节《谢康乐诗注》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刊行;

1923年,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梁启超《陶渊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4年,黄节《汉魏乐府风笺》、《鲍参军诗注》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刊行;

1925年,丁福宝《文选类诂》由医学书局出版;

张陈卿《钟嵘诗品之研究》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

1926年,黄节《阮嗣宗诗注》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刊行;

陈衍《诗品平议》刊载于《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

1927年,鲁迅7月23、26日在广州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

陈延杰《诗品注》由开明书店出版；

1928年，黄节《曹子建诗注》、《魏武帝魏文帝诗注》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刊行；

古直《钟记室诗品笺》由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出版；

陈一百《曹子建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以上所列为真正意义上的“举要”，因为本文不是资料索引，不可能罗列许多书名或篇名，所以只能陈其大概而已，且肯定有所疏漏。不过自上列著作名录看，实颇令人感奋。首先，研究者多造诣很高的著名学者，梁启超、陈衍、刘师培、鲁迅、黄侃、丁福宝、黄节、古直等，率皆近代学术史上重要人物，其中有文化革新重镇，亦有“国粹”派名宿，也有半新不旧亦新亦旧文化要人，其共同特点是学识精深。他们眼光不约而同集中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来，发表各自研究心得，实为本时期文学幸事。他们的学术行为和课题选择，对于后生学子来说，无疑起到一种引导和垂范作用，这对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传统的确立，以及队伍的成长，都具有关键影响和意义。其次，所研究题目，涉及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大作家，以及《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等重要作品，覆盖面甚广，几乎遍及本时期文学的所有重要方面。这就形成了总体性或曰体系性。第三，自研究成果的性质看，有某一作家综合研究，有作品集的注释，有断代文学史著作，有作品辑佚，有作品类编，还有大部头的作家诗文集丛书编辑，以及朝代作品总集的编辑。基础资料工作与思想艺术诠释双管齐下，研究的类型既全，水平亦高，形成研究工作整体上的“厚势”。所谓“水平高”，并非虚美之词，试举数例以明。

一为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此书虽仅五万余字，而缕述汉魏六朝文学流变极为清晰，对每一朝代文学特性及文风之转移演化，皆有简要精到说明。刘师培文学史，共分五课，为“概论”、“文学辨体”、“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魏晋文学之变迁”、“宋齐梁陈文学概略”。其所论说，首先细绎历代“变迁之迹”，然后“考其变迁之由”，“见文章各体，由质趋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以著魏晋文学之变迁，且以名

晋宋文学之渊源”，诸如此类说法，皆显示所持发展的观念，及重视因果关系的方法。故书中虽无明确引用新式理论，表面仍有旧式文论的痕迹，但近代进化论精神的影响是颇为昭然的。

二为梁启超的《陶渊明》，书中含三部分，即“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集考证”。其中尤其第一部分，开始即提出两个文艺批评的“着眼点”：

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

接着便从陶渊明的家世、生活背景说到“时代思潮”，指出：“渊明本是儒家出身，律己甚严，从不肯有一毫苟且放荡的举动，一面却又受了当时玄学和慧远一班佛教徒的影响，形成他自己独得的人生见解，在他文学作品中充分表现出来。——以上说的是陶渊那时的时代思潮。”再述陶渊明的“人格”三大特点及作品表现，最后说陶渊明的人生观。指出：

渊明何以能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艺？一定有他整个人生观在背后。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可以拿两个字包括他：“自然”。……爱自然的结果，当然爱自由，渊明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他觉得做别人的奴隶，回避还容易；做自己甘心做的奴隶，便永远不能解放了。

诸如此类的分析，确实道前人所未道，道旧时代人所未道。在此，梁启超在陶渊明研究领域内，做到了高出前人一肩，而踏上了近代学术的轨道。应当说，他在这里的见解，就是拿到今天来看，仍然是基本适当的，并无落伍之嫌。这里也显示作者不但具有传统学问的深厚根基，而且能够与时俱进，及时吸收近代科学观念。梁氏为著名多产作家，所涉面广，著作等身，而此书当时极享时誉。梁氏逝世后二天，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悼念文章，称扬梁氏“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认为除了史学方面的突出成绩外，在文学研究方面也成果显赫，“关于文学史者，除零篇外，以《陶渊明》一书（内有年谱及批评）最为精绝”（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1929年1月21日）。此评语诚是。

三为鲁迅的著名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文将

传统的“知人论世”原则与近代科学方法包括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结合起来，在全面掌握当时文人行为风气和思想潮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魏晋时期文学倾向及其特点。文章行文畅快，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这虽然仅仅是一篇针对具体时代的论文，但其意义远出魏晋文学研究之外，成为 20 世纪研究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范型之作，具有了近代学术经典性格。

在以上所列重要成果中，毋庸讳言亦有相当一部分仍属于传统式的研究，如大量的作品笺注，即与清代朴学家所做工作无大异，在方法上的区别不明显。但是必须指出，即使是传统色彩浓厚的研究，如那些作品笺注、作品总集等工作，也多少融入了近代的眼光，如黄节的作品笺注，功力上未必能赶上乾、嘉诸老，但在通达方面则有颇所过之，是为得益于近代的理性和理解力。

第二期可称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期，或曰进一步成熟期。在此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同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样，学科近代化由初创阶段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更加成熟”的标志有二：一是近代式的研究更趋深入，更趋稳妥，更趋多样，亦即更加科学化。二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学科中引入并且迅速发展蔓延，成为研究中的新的风景线。以下分别叙述这两方面的大致轮廓。

近代式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在 1928 年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 30 和 40 年代，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老一代”学者，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民主与科学”启蒙时代的狂飙式氛围的消失，他们的研究性格也有了变化发展。那种以奋起战斗的姿态，在观念和方法上取得大破大立、破旧立新效果的激进做法，被深入、细致、扎实、稳妥的研究所取代。“打倒古典文学”、“打倒贵族文学”等口号，已逐渐消歇，“要教会国人一个科学的方法”，也已不再时髦。对古典文学作深入认真解剖，从各种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去阐释其含义，成为研究的主流。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为例，以下的一些成果堪称本时期的代表作：

1929 年，范文澜《〈水经注〉写景文钞》由北平朴社出版；

- 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发表于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
周刊第六卷；
- 许文雨《诗品释》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
- 1930年，罗根泽《乐府文学史》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 钱基博《钟嵘诗品校读记》发表于《小雅》第4期；
- 1931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由大江书局出版；
- 陈钟凡《汉魏六朝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洪为法《曹子建及其诗》由光华书局出版；
- 1932年，《建安文学概论》由北平朴社出版；
- 1933年，曲滢生《汉代乐府笺注》由百城书局出版；
- 沈达材《曹植与〈洛神赋〉传说》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
- 郭麟阁《魏晋风流及其文潮》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
- 叶长青《诗品集释》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
- 1934年，古直《汉诗研究》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
- 1935年，孔至诚《〈孔北海集〉评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铃木虎雄（日本）《沈约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杜天縻《广注诗品》由世界书局出版；
- 1936年，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1
卷第1期；
-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由开明书店出版；
- 骆鸿凯《〈文选〉学》由中华书局出版；
- 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 许文雨《文论讲疏》刊行，内含《钟嵘诗品讲疏》（1927年
刊行之《诗品释》修订本）等；
- 1938年，吴丕绩《江淹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路百占撰《诗品校记》（未刊稿，此据曹旭《诗品研究》转
述）；
- 1940年，闻一多《乐府诗笺》开始连载于《国文月刊》；
- 吴丕绩《鲍照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1941年，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开始在《国文月刊》（第一卷第六

期)连载;

1942年,朱光潜《诗论》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

1943年,郭沫若《论曹植》发表于《中原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1944年,徐复撰《诗品校记》;

詹锳《〈玉台新咏〉三论》发表于《东方杂志》40卷6期;

1945年,逯钦立撰《汉诗别录》及《说文笔》;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1947年,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发表于《现代学报》第1卷第9、10合刊。

以上开列成果名单,有两个显著特点,不同于上一时期。(一)研究者阵营已经有所变化。首先上一时期的老师宿儒虽有若干尚健在,但其学界地位已发生微妙变化。王国维、刘师培早已作古,章太炎、鲁迅亦于本时期前期违世,且鲁迅进入30年代后,精力已很少投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只有若干零篇文章,如《门外文谈》等,谈及有关问题。虽不乏精辟见解,究非专门研究著作,分量与他前期的有关论著不可等量齐观。胡适少年得志,在五四前后学术近代化进程中独领过风骚,但至三四十年代,他在学术第一线已不那么引人注目,甚至有些“淡出”,再加有所旁骛如从政等,其学术活跃程度大不如前矣!他在此时期曾着意研究《水经注》,且自许甚高;然而经多年的努力,也未能拿出高质量的令学界信服的成果,为此颇招一些学人物议。与此同时,一大批新人涌现出来,并迅速成为学科生力军,有的还成为主力。这些人有:陈寅恪、朱自清、罗根泽、范文澜、陈钟凡、陆侃如、冯沅君、隋树森、朱光潜、萧涤非、余冠英、逯钦立等。其中陈寅恪在学术“辈分”上稍老,在上一时期末,他已被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并立,但其年岁实较少,且其述作的主要时间还在三四十年代。(二)在这些代表性成果中,选题面广,专业性强,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大有增加,包括作家思想倾向研究,创作及风格研究,生平研究和考证,作家年谱,作品注释等等。这种局面,在前一时期是没有的。惟有这种局面的出现,才意味着本分

支学科的完整确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才具备了自身的学科体系性。

在此,我们可以取三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略作分析,以见本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特点。

一部是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此书问世于1936年。出版说明谓:“旧刊黄叔琳校注本,在众本中固为最善,而纰缪简陋之处仍繁,未能贻学者之心。范文澜先生研读此书有年,校注非常精审。上册系原著本文,搜集校本至六七种之多,可谓尽善尽美。中册下册系注文,计有三十万言,无不确切精审,尽阐释疏通之能事。”揆诸本书,实非溢美之词。其时撰者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此前虽有郭沫若开创以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上古文学《诗经》、《尚书》等,但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尚无人系统来做。本书可谓第一部。不过本书做法并不张扬,倒是颇为隐蔽。撰者并不像有些学者那样,将马克思主义词句挂在嘴边,挥舞阶级分析的大斧,去对古代作家作品乱砍乱伐(这样的研究者,当时不乏其人),而是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对古籍作细致而切实的整理工作,这种整理由于有新的史观作指导,表现出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的态度,所以与传统的古籍整理有着微妙的区别。也正因此,本书虽为古籍注释,却比一般常见同类之书更严谨,更深入。这种严谨和深入,不是一般学问深浅问题,而是理解力和方法所致,归根到底是撰者有了新的史观,所以能“尽阐释疏通之能事”。

一部是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本书的特色,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它作为一部分体文学史,体现了文学研究向深、细的方向发展。在此前分体文学史并非没有,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即最有名者。与本书同年出版的,又有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但“乐府”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文体,自来无史,所以本书所作的清理工作,表现了研究工作已经向诸多层面铺开,其开拓性格明显。二是本书除“绪论”与“结论”外,史的部分共四章,魏晋、南北朝占了其中二章,几为一半。所以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来说,意义重大。三是本书在思路充分吸取了上一时期文学研究所积累下来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有所开掘。如撰者说:

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

不及和前代的同类文学的影响大。譬如五言诗的全盛时期是建安时代,其所以能臻全盛的原因,是因为自东汉章、和以来,五言诗即继续发展,一步一步地走到建安时代,遂至登峰造极的地位,和当时的赋,当时的散文,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里提出了一条有关文学发展的颇有分量的见解。又如:

文学史的责任是什么?不是死板板的排比,是要考究各种文学的流变及其所以有此流变的原因,察往知来,以确定此后各种文学的正当途轨。

这里对于文学史的任务的叙述,做到了明快扼要。再如:

谈到分时期,更是言人人殊的各有各的理由,或分为三期,或分为四期,或分为五期,或分为六期,五花八门,好不热闹。我以为文学的背景虽多,但政治经济确为重要原因。他们不按朝代分期,说是打破“传统的以代为期的谬见”。但是我们睁开眼看一看全部的文学,是不是因为改朝换代而生出显然不同的现象?就乐府说罢:汉代重在社会问题,魏代则浸入颓丧的人生观的意味,六代则情歌最多,唐初则空中楼阁的表现着理想国的境界,中唐以后则又渐渐地走到社会问题上边,——这不是显然的受了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吗?所以我不敢躲避“开倒车”的讥诮,不敢盲目的学着时髦,仍然以朝代为期。

这里更包含着对 20 世纪前一时期观念革新的一种反思,颇具灼见。而见解之中又不无唯物史观关于政治经济与文学关系的观点。

一部是朱光潜的《诗论》。此书写作时间,据序所云,在 30 年代初“在欧洲时我就草成纲要”,后经多次修改,才于 1942 年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本书共十三章,前七章论诗的起源、性质及特征,属概论性质。后六章转入中国诗论,第八、九、十章为“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上、中、下),分别论“声”、“顿”、“韵”;第十一、十二章为“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分别论“赋对于诗的影响”和“声律的研究何以特盛于齐梁以后”;最后一章为“陶渊明”。

本书在一些理论问题上颇有独自见解,如关于诗的起源问题,撰者认为:“诗的起源实在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要明

白诗的起源,我们首先要问:‘人类何以要唱歌做诗?’”“总而言之,诗或是‘表现’内在的情感,或是‘再现’外来的印像,或是以纯艺术形象产生快感,它的起源都是以人类天性为基础。所以严格地说,诗的起源当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本书也不乏精彩深刻之见,如提出“中国诗的转变只有两大关键。第一个是乐府五言的兴盛,从十九首起到陶潜止”,“第二个转变的大关键是律诗的兴起,从谢灵运和永明诗人起,一直到明清止,词曲只是律诗的余波”,“中国诗走上律的路,最大的影响是‘赋’”。关于陶渊明,本书内容有:(一)他的身世、交游、阅读和思想;(二)他的情感生活;(三)他的人格与风格。作者认为:“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底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见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见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底倾向比较大。”针对陈寅恪的“新自然说”,撰者提出不同看法,说:“他(指陈寅恪)的要旨在渊明是道非儒。我觉得这番话不但过于系统化,而且把渊明的人格看得太单纯,不免歪曲事实。渊明尚自然,宗老庄,这是事实;但是他也并不非名教,薄周孔,他一再引‘先师遗训’(他的先师是孔子,不是老庄,更不是张道陵),自称‘游好在六经’……”所论似更切合陶渊明实际情况。

朱氏此书的立足点,正如他自己标榜的,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明显属于五四以来受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影响较大的科学学派类型。书中序言也直接提及胡适的影响,并向胡适致谢。不过本书并非胡适思想学术的简单继承延续,而是有所丰富深入,而且别开生面,主要在于能够综合运用文艺心理学等新兴学科,来剖析文学问题;加之撰者对于中西两方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史,都相当熟悉,因而所阐述问题,皆能切合实际,入于情理,其论点也比较妥贴,体现了文学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而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来说,本书的出现,也意味着在三四十年代本分支学科在近代化道路上又取得了重要进展。

以上所说范、罗、朱三家,在本时期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代表性研究者。其著作特色鲜明,一方面显示了各自所擅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家派

——他们或是唯物史观的，或为西方现代的，或者介于二者之间的，各自成为本学科领域内的一“极”；另一方面，他们的“极”，又全都属于三四十年代的，他们绝不同于五四前后的先辈学者。可以说，此时期的研究，正向着深和细这两方面发展，而研究的视角和方式也比他们的前辈更丰富多样。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具有新的知识结构。这一辈学者一方面继承了五四那一代人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同时他们又接触了更多的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现代主义诸文化流派，以及与现代主义几乎同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使他们的思想意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近代化”。比如沈雁冰，一般人都知道他早年致力于介绍西方文学，而他在1922年即已开始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孔雀东南飞》。而沈氏的代表性还不够，陈寅恪、朱光潜、闻一多、梁实秋、钱钟书等人才是本时期最为活跃、最为抢眼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这是一批全新结构的人物，他们对西方文化学术的了解，无疑更甚于沈雁冰，甚至也超过“前辈人物”中最“西化”的胡适。他们能够相当熟练地运用各种“现代”的观念和方法，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并由此别开生面。即使是范文澜、罗根泽这样的学者，他们的知识类型和结构，同样也是“现代”型的，只是属于现代学术不同的内容和层次罢了。这些有着新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眼光的一代学者，他们的成就合起来，构筑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在20世纪第二时期的新台阶，使得学科提升到一个更加近代化而且更加丰富多样的阶段。

第三期可以称为学科发展的统一期。所谓“统一”，即指在学术思想方面实现了根本的一致，此统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统一，而实现统一的途径和手段则是学术批判和思想改造，甚至还采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分界，从此中国结束了近百年被列强侵略欺凌的耻辱，也结束了大小军阀的割据，实现了空前的政治统一。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也使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走向统一，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经济上的国有化、集体化运动，以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思想文化上的批判运动，在五六十代连绵不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而且影响严重。原因在于当时